

鲜为人知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情真相

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20世纪90年代，陶慧敏主演的电视剧版《杨乃武与小白菜》更是让这个故事故事家喻户晓。然而，历史上这一冤案的事实真相却鲜为人知。本文意在披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内幕。

杨乃武、小白菜与葛品连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婚3次，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8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与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巷清口新造3间房。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多套新房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其母向杨乃武租了一间房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住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3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8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开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

呕吐。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葛品连之母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葛品连之母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70岁。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作伴沈祥和丁门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刘锡彤感于陈竹山之言，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刑。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

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实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情况。刘锡彤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事先商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临进都察院前，王廷南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进去递交。王阿木说自己是王廷南。这样，王阿木就被当做王廷南递解回浙江杭州。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上奏皇上，皇上旨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拖不了案。

刑部大审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他们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在审问进京人证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经件作荀义、连顺鸣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因病而死。

由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

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审理全过程历时约4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以种桑蚕度日。于1914年病故，享年74岁。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于1930年圆寂，享年75岁。

李照光

袁承志避难浔泥国

让次要人物率先出场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特征，目的在于引出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在《碧血剑》第一回，金庸首先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东南亚浔泥国(今文莱)的中国人张朝唐的故事。张朝唐的先辈很早就扎根东南亚，经过多年奋斗，张氏家族在当地经营得兴旺发达。为了给家族争光，张朝唐前往祖籍福建参加科举考试。他到中国时，恰逢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建立统治之时，各地反清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堪。在途中，张朝唐遭遇劫匪，在走投无路时被几个隐居乡间的农夫所救。这些人其实是明朝抗清将领袁崇焕的旧部，他们肩负着抚养小主人袁承志和重树反清大旗的重任。就这样，张朝唐与小说主人公袁承志相识了，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小说最后一回，已成为民间抗清领袖的袁承志看到反清复明的大势已去，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却无安邦救国的权谋韬略，自己又不愿落草为寇，不禁有些心灰意懒。这时，他回想起张朝唐说过浔泥国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便产生了避难海外的想法。随后，他召集一帮同道中人从山东乘船前往东南亚，到达“浔泥国左近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们赶走了盘踞在那里的红毛海盗，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实，袁承志避难海外的例子并非金庸独创。明末清初小说家陈忱曾写过一部《水浒后传》，描述了以阮小七、李俊为首的这批原梁山好汉，因不堪奸臣恶霸的欺压，纷纷再次造反，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出逃海外。后来，他们在暹罗(即泰国)成就了一番大业，李俊最终成为暹罗国主。这些情节虽属虚构，却同《碧血剑》一样反映了当时不少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现实。这些中国移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剧增。

华人血汗成就东南亚盛景

移居东南亚的这些避难者大多是贵族、军事将领、知识分子和巨商富贾，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的精英，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不少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工匠。他们为当地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末英雄陈上川率领官兵历经10年把同耐河到湄公河的广袤土地开垦为越南一流的良田，并兴建了一个城镇“堤岸”，将该地区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大米市场。这些华侨深得越南人的敬重，被尊称为“伯父”。

华侨还开发了东南亚的工矿业。在印尼加里曼丹，特别是三发一带，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人，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就连马来西亚的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精力和事业成就了今日的马来西亚。”

还有许多华侨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海外贸易的侨居地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匠、泥水匠、织工，行当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华侨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的菲律宾成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番薯、烟草等拉美农作物经这里传入中国。

追寻袁承志下南洋的足迹

金点强

